

浙江路桥：百家“红色驿站”推动“最多跑一次”

本报记者方列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突出实用导向、融合导向、需求导向，以党建聚合共建资源、优化要素配置，在全区范围内建成“红色驿站”116家，着力推动群众办事就近“最多跑一次”。目前，“红色驿站”累计为群众办事3万余件，受惠群众达10万余人次。

突出实用导向布局设点，着力破解“有场所缺人气”问题。按照“就近就便，便民惠民”原则，在市场、医院、商圈、中心村等人流量密集以及群众有需求的区域建设“红色驿站”，并根据站点运行人流情况，定期进行调整，实现

莫让城乡接合部成监管『真空区』

新华社沈阳6月6日电(记者于也童)水更清、树更多、路更净……近年来，沈阳城市环境不断优化。但记者近日走访发现，部分城乡接合部却由于监管“真空”成为被忽视的“死角”，存在基础设施薄弱、道路破损严重等问题。记者连日来走访沈阳一些城乡接合部看到，有些道路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坑坑洼洼，破损严重。位于沈阳市东部一条全长约2公里的道路，是许多车辆进入市区及沈城北部的通道之一。但这条道路非常狭窄，由于多年未进行修整且来往大型货车多，路面已经凹凸不平。记者走访当日，正好遇到降雨，没一会儿该路段就出现大面积积水，市民在路上行走都小心翼翼。此外，有的道路由于曾属农村道路，在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及时升级改造，与城区道路的面貌形成反差且基础设施薄弱。记者走访发现，其中一条道路仅4公里的区间就存在路缘石缺失及破损9处，人行道隔离设施破损3处，机动车道破损2处，井盖缺失、破损2处。除了道路陈旧破损、乱停车也是城乡接合部存在的问题之一。在沈阳市沈北新区一些街道上，大量违章停车让本就狭窄的道路显得更加拥挤，一些居民车辆就停在小区门口的道路上，严重影响车辆正常通行。“我的车已经靠边了，能出啥事。”面对记者的询问，一位车主不以为然。在该路段住了一年的李先生说：“今天还算好的，一到节假日公园附近都停满了，各种车辆横七竖八停在一起，从高处看就像在俄‘俄罗斯方块’。”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接合部的管理和整治不应被忽视。记者采访获悉，沈阳相关部门已把城乡接合部的整治提上日程。“通过前期摸底排查，我们已把相关问题统计完毕，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点对点的整治措施，各区也将按照职责分工全力推进城乡接合部的整治。整治提升将于8月底前结束。”沈阳市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10分钟红色服务圈”全域覆盖。

坚持把服务群众作为“红色驿站”建设初衷，建设贴合不同群体的服务站点，设置个性化的“7+X”服务项目，着力打造群众“想得到、用得着”的“桥头堡”。

突出融合导向共建共管，着力破解“有资源缺平台”问题。依托“红色驿站”，路桥区全面开展“三百三联”活动，选派537名领导干部、机关党员干部、律师、会计师、税务师到全区218个村(居、社区)和100家企业蹲点共建。今年以来，全区各蹲点组共开展志愿服务382场次，如司法局蹲点组每月在云湖村“红色驿站”开展免费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申请、人民调解申请活

动，吸引500多人参与。

由组织部门牵头，整合信访、公安、司法、卫健、行政服务、团委、红十字会等9个部门职能，共同打造群众家门口的服务平台。同时，吸纳站点周边村社、两新、机关等党组织，定期组织开展开放式组织生活，着力打造区域党组织互联互通、共融共享的组织堡垒。

突出需求导向创优载体，着力破解“有服务缺温度”问题。通过嫁接96345党员志愿服务平台，路桥区为每个驿站配备一支专业化的志愿服务团队，常态化开展民生咨询、应急救护、爱心众筹等服务。创新打造“红色驿站+政务E

站”工作模式，将集成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社会民生等多项业务的自助服务平台“政务E站”投放到116个“红色驿站”中，着力打造全年无休的政务审批终端站点。目前，镇(街道)层面“红色驿站”可办事项达369个，村级层面“红色驿站”可办事项达24个。

依托“红色驿站”，当地组建“红小二”代办队68支，将全区2.7万名党员充实到基层村居一线，着力打造代办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目前，全区各代办点共完成代办事项2393件，群众满意率达99%以上。



挺进“孤岛”村

▲这是被洪水围困的大山村(6月10日摄)。 本报记者陆波岸摄

本报记者卢婵婷、赵曼君、胡佳丽

大山村村委会所在地到普益乡政府的道路有4公里多，以往开车只需要十几分钟，而这一次，刘志南用了将近4小时。

一把镰刀，是他疏通道路的唯一工具，翻山、蹬水、砍树枝，一路跌跌撞撞，他终于从“失联”的大山村闯了出来。

连日来，广西阳朔县遭遇暴雨侵袭，7日清晨，位于普益乡的大山村发生多处山体塌方、滑坡，通村公路多处被埋，路基损毁，全村供电及通讯中断，约900人受困。

刘志南，大山村村委会干部，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于8日下午徒步走出大山村向外界救援。“群众急、我也急，一定要开一条路走出去。”

刘志南来了，乡党委书记莫翠芳悬着的心终于稍微放下一点。根据刘志南汇报的受灾情况，乡党委政府连夜布置救援抢险工作。

9日，普益乡党委政府20余名工作人员和乡卫生院一名医生携带充电宝、干粮等，与赶来的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一起徒步挺进大山村。

刘志南带领“先头部队”共5人先行出

发，沿着他闯出去的山路挺进。“90后”医生吴国超背着几十斤的药品负重前行，左一脚淤泥，右一脚碎石，一次次弯腰穿过倒塌的树干……

在大山村，听说医生来了，一些发烧、感冒、咳嗽的群众陆续赶来。“村民需要你，看到他们求助，我怎能无动于衷。再艰难的路也要挺进来。”吴国超眼睛有点湿润。

在这场“孤岛”村救援中，外界救援力量不仅给受灾群众送来了帐篷、饮用水、方便食品等生活必需物资，更给焦虑无助的村民带来了希望和关怀。

挺进大山村的救援人员被分成6个分队，艰难跋涉分赴各自自然村，逐门逐户了解灾情。“我们这是丘陵地带，许多山头都有不同程度的塌方、滑坡。”普益乡乡长倪发军带队深入灾情严重的楠木村，成功撤离17户49名受灾群众。

一位80多岁的老人独自守在自家的老房子不愿离开。“她说‘我都这把年纪了，埋了我也无所谓’，但是每个生命对我来说都至关重要。”倪发军说。还没等他回过神，年轻的消防队员就把老人背在背上，向安全的地方转移。

“为了不让撤离出来的群众返回危房，我们一整晚陪他们拉家常，一直没合眼。”普益乡“90后”干部高志亮说。

天亮了，雨停了，大山村村委会所在地通往乡政府的路基本疏通，坚守了一夜的救援人员终于可以小憩一会。倪发军的手机里，保存着多张救援人员坐在沙发上、躺在摩托车上休息的照片。

大山村受灾群众约242户900人，无一伤亡。“没有人员伤亡，就是不幸中的万幸。”莫翠芳说。

10日上午，部分乡干部从大山村徒步返回普益乡政府。经过抢修疏通的道路虽然泥泞不堪、损毁严重，但已经勉强能够通行。一些村民骑摩托车下山采购生活物资。

午后，暴雨倾盆而至，大山村多个山头不断滚落乱石、泥土，通村道路再次被阻断。“我要再进去看看道路通行情况和群众受灾情况。”倪发军说。

“如果再次让你挺进大山村，你还去吗？”记者问。“去！”高志亮说。“走，给村民送物资去。”“好。”10日傍晚，一声召唤，刚出村还没来得及休息的高志亮又向大山村挺进。

新华社合肥6月10日电(记者汤阳、戴威)芒种时节，来自苏北的种粮大户张辉，收获了在安徽定远种下的头茬小麦。

近期当地持续晴热少雨天气，让这个与庄稼打了多年交道的“老把式”，来不及细品丰收的喜悦，又开始为下茬庄稼该选择水田还是旱作盘算起来。

2019年，在家乡江苏泗洪从事农业种植的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做出一个让很多人吃惊的选择——“去安徽租地，把家庭农场彻底搬过去。”

“当时在老家种了109亩，再想扩大面积，一是拿地比较困难，二是地租也比这边贵将近1倍。”一次偶然的机会，张辉听回乡的大户们说起，同在长三角的安徽定远，每亩田租金只要四五百元。低廉的田租、集中连片的耕地，在他心里激起不小的涟漪。

对于张辉的想法，爱人程雨并不看好。“离开故土奔赴异乡，这样的选择无异于一次赌博，远不及在家来得踏实。”她觉得太过冒险。关键时刻，父母的支持为张辉坚定了走出来的信心。“尤其我父亲，特别支持我出来闯闯。租地的钱都是从父母和朋友那东拼西凑的。”张辉笑着说。

然而，当543.9亩土地流转到手之后，种什么小麦品种，又让他颇费心思。为打消张辉的顾虑，定远县农技人员不但多次登门，还帮忙联系了粮食收购企业，承诺采取订单种植的方式，提供从种子到收购“一条龙”服务。经过再三比较，最终张辉选择了一种名为“宁麦13”的优质弱筋小麦品种。

从那时起，定远县朱集村的地头便多了一个一米八几的壮硕身影。与当地一些种粮大户有所不同，从拖拉机到旋耕机，从铲斗车到无人机，好像跟种地有关的“十八般武艺”，这个异乡来的大个子样样都能拿得起。

当时间进入6月，张辉的地里已是风吹麦浪，一片金黄。眼看着来安徽种下的头茬小麦即将丰收，他一面急着联系农机，一面又把堂弟和朋友们从200多公里外的老家喊来帮忙。

“亩产大概800斤左右吧，根据合同，价格能比同类小麦市场价高出3%。”麦田里，联合收割机轰鸣而过，手拿镰刀的张辉走在田埂边，不时弯腰把散落的麦穗聚拢着割回田里。

“不能全指望机器，那割不到的不就可惜了吗？每个穗子上都有小麦，聚到我这都是钱呢。种田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张辉说。

对张辉而言，种地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种田多自在，现在都是机械化作业。风调雨顺的年景，我们种田确实比较快活。”他说。

「老把式」的「新选择」

异地种田，苏北种粮大户在安徽喜获丰收

700余人掉进“杀猪盘”圈套 长沙警方破获特大跨境诈骗案

新华社长沙6月10日电(记者刘良恒)长沙警方10日通报，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近期成功侦破一起跨境“杀猪盘”网络诈骗案件。该案受害人多达700余名，涉案金额1300余万元。目前长沙警方已依法刑事拘留7名犯罪嫌疑人。

2019年12月20日，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望城坡派出所接到吴女士报警，称其网上交友后被带入博彩骗局。接警后，岳麓警方反诈中心立即开展侦查，发现一个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杀猪盘”诈骗团伙，且有部分涉案人员已经回到国内。今年6月5日至6日，专案组在贵州独山、福建厦门开展收网行动，抓获陆某堂等10余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查明：2019年3月至今，陆某堂组织多人前往菲律宾马尼拉设立诈骗窝点，通过各类相亲交友软件寻找结识国内单身女性，并用伪造“人设”的微信号加受害人为好友。不法分子在聊天过程中，先以恋爱名义博取受害人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参与网络赌博。其作案手法，是前期以微利引诱，等受害人大额充值后，再以控制输赢、拒绝提现等方式骗取受害人钱财。

目前，陆某堂等7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

传播违法违规信息

新浪微博被约谈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0日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新浪微博负责人，针对微博在蒋某舆论事件中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以及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等问题，责令其立即整改，暂停更新微博热搜榜一周，热门话题榜一周，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同时，要求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依法从严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国家网信办有关业务局负责人指出，网站平台应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管理制度，明确内部审核处置流程，既不得为违法违规信息提供传播平台，又不得随意干预信息正常呈现、干扰网上传播秩序。国家网信办将进一步强化日常监管，督促相关网站平台加强内部管理和自律，依法依规开展服务。

警惕激进“拆村并居”给农村带来系统性风险

桂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坚持乡村建设，通过保护型城乡政策实施，将乡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压舱石”。

乡村稳定，则整个社会稳。近期，部分地区全面推行拆村并居，强制改变乡村面貌，推动农民上楼，有可能带来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风险。乡村稳定源于农民的生活稳定，农民与土地结合，构成防止社会极化的最稳定力量。拆村并居之后，对于农业生产而言，在空间距离、生产工具存放、耕作便利和互助合作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农民上楼往往伴随着土地的大规模流转，拆村并居会造成农民被动“失地”。脱离农业生产后，农民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对农村老年群体、贫困群体和传统的“中坚农民”冲击巨大。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时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

的关系。”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涉及可能造成农民“失地”的改变、改革，必须慎之又慎。

地方政府推行拆村并居的一个动力是，通过宅基地腾退，产生建设用地指标，用于扩大城市开发建设规模。

拆村并居需要安置赔偿、基础设施重新配套，所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成本高昂。地方政府一般是将这部分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商住用房开发而非工业建设，为了消化房地产，地方政府出台措施推动农民进城买房，客观上促进财富加速流入城市，对乡村振兴则往往益处不大，甚至起反作用。

建设一个一千户规模的新型社区，粗略估计，各项支出超过亿元。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建设用地指标交易来平衡资金。全国农村建设用地超过2亿亩，在农村大而城市小的总体格局下，具体到一个县、一个市或一个省的农村宅基地腾退指标，会超出当地建设用地指标需求几个数量级。

供大于求，拆村所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超过城市需求，最终，要么会增加房地产库存，要么会变成地方政府债务。拆村并居背后的靠房

地产来拉动经济的短视思维，值得警惕。在过去40多年中，我国农村大体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和2000年之后的两轮农民建房潮，砖混结构的独栋楼房和带院落平房是农村普遍形态。农民的多年储蓄和大量的社会财富，已经投入到农村建筑中，全国农民居住条件普遍较好。

少数贫困山区农民也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改善了居住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行大规模拆村并居活动，无论最终成本由谁承担，都会造成物质财富的极大浪费和生态不友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项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物质财富还没有充裕到可以全盘大拆大建阶段。无论是基于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理念，还是站在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看，大规模拆村不应构成我国乡村建设的主流形态。

立足我国现代化阶段与城乡关系大局，当前的乡村建设应当坚持如下几点：一是保持农村基本建制稳定。部分地区推行拆村并居的理由是建制村规模小，目标

是改变基层治理体系。行政村、村民组和自然村等农村基本建制，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可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落实基层民主管理方面入手，没有必要改变农村空间形态。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不应以农民上楼为前提条件。

二是加强农村保底建设。在大部分农民居住条件较好的情况下，农村建设应当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包括道路、水利、网络等，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的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城市继续对农民开放，一部分人自愿进城生活，还有一部分不愿进城和没有能力进城的农民，也可在乡村享受到现代化成果。

三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遵循底线原则。城镇化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农民退出农村土地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保持稳健的城镇政策，坚持中央确定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底线，基层政府在农民土地退出方面坚持示范和引导，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不搞强迫命令、刮风、一刀切，减少行政干预，避免激进。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